

# 复合型原乡认同：闽东北礮岛海外移民的田野调查与分析<sup>\*</sup>

童莹

原籍福州长乐、现定居宁德霞浦北礮岛的海外移民群体，为适应不同阶段的迁移处境与社会环境，在多阶段迁移与跨国流动中形成了以多重地方指向为基础的复合型原乡认同。在早期迁移阶段，北礮岛移民多以“长乐人”自居，借助祖籍地社会网络融入海外社会；在海外立足后，通过建立北礮同乡组织强化以岛屿为核心的地方认同，并推动连锁移民；随着家庭成员迁居霞浦县城，县城逐步成为海外移民归国后的主要生活空间。长乐、北礮岛与霞浦县城的原乡认同并未相互替代，而是在跨国实践中被选择性激活，形成具有功能分化的复合结构。其中，长乐承载祖籍记忆与象征意义，北礮岛构成群体认同基础，霞浦县城则更多对应现实生活需求。不同原乡在认同强度上呈现出层级差异，并在代际之间不断调整：早期移民更强调长乐的“根”与通道意义，后续移民强化北礮共同体认同，而新一代则更看重与自身日常生活经验关联的“家乡”。进一步来看，复合型原乡认同不仅体现为多重空间的并存，也体现为资源网络、宗族关系与情感归属的交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中国沿海新兴侨乡语境下原乡认同的经验基础，并为理解海外华侨华人认同的层次性、动态性与情境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复合型原乡认同 跨国实践 海外华侨华人 新兴侨乡

作者童莹，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地址：福州市，邮编 350117。

## 一、引言

在 21 世纪全球流动成为常态的背景下，跨国移民如何理解“家乡”“原乡”与“祖籍地”，始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关怀。“原乡认同”(homeland identity)并非一开始就是界定清晰的社会科学概念，而是在跨学科研究中逐步形成的。人文地理学首先从“地方经验”的角度切入，对原乡问题奠定了情感与意义层面的分析基础，强调家乡是个体“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情感核心。段义孚指出，人们通过体验、身体与记忆赋予地方意义，“家乡”之所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跨国留守儿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24CMZ0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民族研究》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

以重要,是因为它承载了最深的熟悉感、归属感与情感根植。<sup>①</sup>这一视角使“原乡”被视作与主体经验密切相关的情感—意义空间,而非单纯的地理位置。

系统意义上的“原乡认同”讨论,则是在离散研究兴起后逐渐成形。20世纪末,随着对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跨国族群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将“对原乡的集体指向”视为离散族群的重要特征。早期研究多强调原乡在离散认同中的中心地位,认为其为群体提供稳定的历史记忆、道德参照与想象核心。赛夫兰(William Safran)提出可通过一系列特征来识别离散群体,其中包括“保持关于原始家园的集体记忆、愿景或神话”,“把祖籍地视为真正家园并认为自己或后代终将回归”等条件。<sup>②</sup>在这一框架中,原乡往往被假定为一个相对确定且持续有效的象征中心。然而,随着离散研究的理论深化,人们开始反思这种“原乡中心论”。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指出,若将离散限定为围绕“起源/回归”的单一叙事,容易遮蔽移民在多重空间中的横向流动、文化混杂与跨地域实践。<sup>③</sup>他主张将离散理解为一种在不同地点之间持续建立联系的实践网络,由此,原乡不再被预设为唯一的认同原点,而是被置于流动性与历史情境之中重新理解。这一去中心化的思路,在文化研究关于认同建构的讨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霍尔(Stuart Hall)提出,原乡认同并非稳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始终处于生成之中、在特定历史与权力结构中被生产出来的”。<sup>④</sup>吉尔罗伊(Paul Gilroy)关于“路径而非根源”的论述,进一步凸显了原乡认同在流动、混杂与跨文化互动中的生成性特征。<sup>⑤</sup>至此,原乡从一个固定的起源点,逐渐转变为流动中的意义节点,其认同指向随着主体所处场域的变化而调整。

跨国主义研究为理解原乡认同的实践维度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取向批评将迁移理解为“原居地—目的地”的线性路径,指出移民往往同时嵌入多个社会场域之中。相关研究强调,移民通过跨境实践维持“祖籍地与定居地的多重社会关系”,<sup>⑥</sup>使原乡不再是一个单一且稳定的象征中心,而是在跨境互动中不断被实践化与再生产的地方。进一步的研究指出,跨国行动会“在多个地点重塑生活的方式”,<sup>⑦</sup>从而使原乡认同随着移民的迁移阶段、家庭策略与社团网络而被持续激活、调整,甚至重新定义。还有学者指出,跨国社会场域本身具有结构性力量,能够催发“多地点归属”及跨境情感连结,使原乡认同呈现出复杂的层次性与情境性。<sup>⑧</sup>

尽管上述理论已充分揭示原乡认同的流动性、多地点性与建构性,但其分析框架仍存在两方面不足:其一,多以“一个原乡(祖籍地)—多个移居地”为基本前提,将原乡预设为单一且先在的认同起点,从而压缩了“原乡”内部可能存在的层次差异;其二,忽视了移民在进入跨国流动之前的多阶段迁移历史,未能充分解释国内迁移经历对认同结构的塑造作用。由此,既有研

①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 136—152.

②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 1, No. 1, 1991.

③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1994.

④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22.

⑤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9.

⑥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and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1994, p. 7.

⑦ Peggy Levitt, *The Transnational Villag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5.

⑧ Steven Vertovec, “Trans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27, No. 4, 2001.

究多将多重地方经验归并为单一“原乡”，从而遮蔽了不同地点在认同结构中的差异性功能。

这一问题在中国经验中尤为突出。既有研究表明，华侨华人群体常呈现出多阶段、跨区域的迁移特征，例如由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由东南亚再流动至欧美等地。这些移民在不同居住地之间逐步形成多重社会与情感联结，使原乡认同呈现叠加与分层特征。<sup>①</sup>与此同时，回流移民进一步加剧了原乡认同的复杂性：部分归侨未返回迁出地，而是在国内其他地区定居。其中，有些自愿归国者选择在大城市生活，使祖籍地更多成为情感与象征层面的参照；而被迫回流者在国家统一安置与制度嵌入下，逐渐形成对定居地的“家乡”认知。<sup>②</sup>在这两种路径下，原乡认同均不再指向单一地点，而是在制度环境与生计条件的制约下被持续重构。无论是跨国再迁移，还是回流后的再定居过程，都表明“原乡”并非单一且固定的指向，而是在多重空间转换与社会关系重组中不断生成、分化并被重新赋予意义。不同地点在移民生命历程中承担着不尽相同的功能——既可能是历史记忆与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可能是现实生活与制度嵌入的场域——从而共同构成具有内在差异的认同结构。

除此之外，中国汉族各民族迁徙历史悠久，同样为理解原乡认同的复合形态提供了重要参照。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研究，围绕宗族与区域社会展开分析，揭示了多阶段人口迁移中认同生成与整合的基本机制。华南社会正是在持续迁徙过程中，通过宗族组织与祖先叙事，将不同来源的人群整合为共享历史记忆的地方共同体；而在进一步向珠江三角洲、香港，乃至海外扩展的过程中，这种认同又依托宗族网络与社会关系得以延续与重构。<sup>③</sup>从这一经验出发可以看到，地方社会中的原乡认同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地点，而是在多阶段迁移、宗族整合与社会互动中逐步沉淀与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因不同迁移阶段而形成的“家乡”在整体认同结构中被赋予差异化的位置与意义。由此可见，地方社会认同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国家、区域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建构与调整。因此，“原乡认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迁移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复合结构，其中不同来源与不同阶段所关联的地方，分别承担着差异化的意义与功能。

基于上述经验，有必要突破“单一原乡”的分析预设，从多阶段迁移的历史过程出发，理解原乡认同在不同地方之间的分化与组合。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提出“复合型原乡认同”这一概念，用以指称在多重迁移轨迹与跨国实践交织条件下，多个具有不同历史来源与现实功能的地点，被整合进同一认同结构之中，并在情感、象征与实践层面形成具有内在层次的组合

<sup>①</sup> 参见 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 Hawaii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黎相宜、周敏:《抵御性族裔身份认同——美国洛杉矶海南籍越南华人的田野调查与分析》,《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王保华、陈志明编:《唐人街:镀金的避难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张倍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sup>②</sup> 参见 Chee-Beng Tan & Qichun Lin, “Remigration and Re-Establishing Home: The Turbulent Lives of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Yingde, Guangdong,”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43, No. 4, 2019; 黄小坚:《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版;奈仓京子:《“故乡”与“他乡”:广东归侨的多元社区文化适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董莹、王晓:《被迫回流移民安置的中国经验——华侨农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等。

<sup>③</sup> 参见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刘志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史》1993年第4期等。

关系。该概念旨在揭示原乡认同的结构性差异及其生成机制,从而对既有跨国主义与离散研究形成补充与推进。

中国东南沿海部分新兴侨乡的移民实践,集中呈现了上述理论张力:海外移民群体的祖籍地、共同体形成空间与回流后的生活重心并不完全重合,这些地方在不同历史阶段被选择性激活。本文所考察的北礮岛移民个案,正是这一复合型原乡认同在具体情境中的体现。北礮岛居民的祖籍可追溯至福州长乐的金峰镇与潭头镇,先并于近代迁入宁德霞浦的北礮岛定居,并逐步形成以岛屿社区为核心的地方社会。20世纪90年代初,在祖籍地长乐海外亲属的带动下,北礮岛出现规模性出国潮,跨国迁移由此迅速展开。在这一过程中,长乐、北礮岛与逐渐成为移民回流后生活中心的霞浦县城,在移民的生命历程与跨国实践中承担着差异化的功能,共同构成其原乡认同的多重指向结构。本文旨在通过这一案例,探讨在多重迁移历史与持续跨国流动交织的条件下,复合型原乡认同如何生成,并通过移民的日常实践与表达得以维系与调适。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2017—2024年间对北礮岛海外移民群体开展的持续跟踪田野调查。鉴于海外移民高度流动、生活空间分散的特点,研究采用多点民族志方法,以福州长乐、宁德霞浦县城及北礮岛为核心田野点,对海外移民、侨眷、祖籍地亲属及相关侨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同时,结合跨国迁移的现实条件,本文通过线上访谈对居住海外的北礮岛移民进行补充调查,以获取其跨境实践与认同经验的第一手资料。为遵循田野调查的伦理规范,文中涉及的所有人名均作匿名处理。

## 二、多阶段迁移背景下复合型原乡认同的形成

与那些直接从祖籍地进入跨国流动的移民群体不同,北礮岛移民的迁移经历呈现出以祖先迁移为起点的跨代际延续特征。他们的祖先由福州长乐迁至北礮岛,使“长乐”在跨国迁移发生之前即已作为祖籍地存在于群体认知之中。随着跨国移民的展开,受生计与生活条件变化的影响,不少移民家属从岛屿迁往霞浦县城,使县城逐渐成为移民回流后的主要生活空间。由此,多阶段迁移所累积的空间经验与生活实践,塑造了多重地方指向的原乡认知,并为复合型原乡认同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 (一) 岛屿定居与祖籍记忆

北礮岛位于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东南部,是四礮列岛的主岛,也是目前唯一有居民常住的岛屿,总面积1.88平方公里,距大陆最近点约18公里。岛屿整体由花岗岩构成,地势呈南陡北缓的形态。岛上既保留有部分过去遗留下来的军事设施,也延续着较为完整的传统渔村景观。北礮岛仅设一个行政村——北礮村,下辖北澳、南澳、可门三个自然村,户籍人口约2600人。北礮岛与霞浦县城之间不通陆路,居民的生产与生活长期依赖海上交通。早年间,人们进出岛屿主要依靠渔船。随着人口流动和对外联系的增加,村民通过集资购置客船,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公共交通。笔者2017年首次进入北礮岛时,霞浦至岛上的客船为隔日一班,航程约1小时50分钟。

这种区位条件与公共资源配置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岛屿社会的发展。岛上水资源、医疗与教育资源均较为匮乏,既无医院亦无诊所,仅有的小学亦因生源不足而停办,现已改为民宿。因此,北礮岛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霞浦县城。在上述结构性条件的作用下,

长期留居岛上的人口一度不足100人。近年来,随着海岛景观在网络平台上走红,北礮岛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对外交通条件有所改善,客船班次调整为每日一班,航程缩短至约50分钟。部分居民返乡经营民宿或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岛上常住人口有所回升,目前约200人。

总体而言,尽管北礮岛纳入县域治理体系,但受区位与资源限制,居民的日常生活处于封闭与边缘化状态。这种结构性不利条件使岛屿难以完全承载家庭的生计与发展,也促使岛民逐渐形成“以岛为家、向外谋生”的生活逻辑。与此同时,正因环境相对封闭,北礮岛居民历经数代,仍较好地保持了祖籍地福州长乐的语言、风俗与认同。

北礮岛居民的祖籍都在福州长乐,基本来源于金峰镇、潭头镇两地。关于他们迁徙的原因,笔者在访谈中几乎得到如出一辙的答案。如老村书记JYB就讲道:

我们是长乐的,为了躲避倭寇,我的祖先被迫从海上逃难,逃到北礮岛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自然条件不错,适合生活,所以就留在这里,现在是第四代在这边了。<sup>①</sup>

此后,家族成员陆续迁入,最终在岛上定居下来。按照村民的普遍说法推算,多数家族已在北礮岛延续至第四代左右,个别家族甚至可追溯至第六代,其迁徙历史大致已有一百五十年之久。有学者指出,这类以“避乱”为核心的地方记忆,无法与史籍中倭患时间完全对应,北礮岛更可能是在长期渔业生产中逐步形成定居点。<sup>②</sup>

无论是地方记忆中强调的“避乱迁徙”,还是学术分析所指出的“生产性定居”,二者都指向一个共同事实:北礮岛居民的祖籍地始终清晰地指向长乐,而岛屿本身则是在迁徙过程中逐渐被转化为新的生活空间。这种对“来处”的持续指认,使得长乐不仅作为一个历史地名存在于家族叙述中,也通过语言、婚姻选择、风俗实践等方式,被不断嵌入北礮岛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其原乡认同结构中最早,也是最为稳定的一层。

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延续上。在北礮岛,无论年龄、性别或是否有出国经历,当地居民全部操长乐口音的福州话作为家庭语言和日常交际用语。多位受访者在访谈中提到,“我们是长乐人,当然讲福州话啊”。相较之下,霞浦话在北礮岛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非常有限。

北礮侨联主席JY这样说:

以前的时候,我们哪怕去城关也都是讲福州话的,他们讲的霞浦话我们不会,但是可以听得懂,现在慢慢年轻人也懂得说霞浦话了。<sup>③</sup>

这种清晰的语言区分,使祖籍地在日常交流中被不断唤醒,也在无形中划定了群体边界。

语言的延续,也与通婚和宗族观念密切相关。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北礮岛居民几乎不与霞浦人通婚,择偶范围主要集中在祖籍地长乐,尤其是金峰、潭头一带。

北礮村委会妇女主任JF回忆:

以前岛上年轻人结婚,都是回长乐托人找对象,基本没有和霞浦那边结婚的。<sup>④</sup>

老人CDH进一步补充道:

过去交通不便,我们去城关坐船也要两个小时,回长乐坐船半天就到了,而城关那边说话,还有风俗习惯都和我们不一样,那大家就更愿意去长乐找。<sup>⑤</sup>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9月11日在北礮村委会对JYB的访谈。

② 黄英湖:《闽东霞浦县一个海岛村庄的海外新移民研究》,《八桂侨刊》2020年第3期。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8年2月23日在霞浦县城JY家的访谈。谈话之中所说的城关,即城关镇,霞浦县城所在地。

④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9月13日在北礮岛老年活动中心对JF的访谈。

⑤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9月13日在北礮岛老年活动中心对CDH的访谈。

这种婚姻取向不仅维系了血缘网络,也进一步巩固了宗族意识。北礮岛上主要有姜、曹、陈、王、施等多姓并存,其中姜、曹两姓人口最多。各姓氏普遍延续的是长乐的族谱体系,族谱中详细记载了哪一代从长乐迁徙至北礮岛,并将岛屿定居视为家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例如,北礮岛施姓家族的族谱封面上赫然写着“长乐大宏玉井施氏族谱”。

施性家族的 SXJ 表示:

长乐有我们施姓的祖坟,那边族谱里面也有我的名字,所以我每年清明都去长乐祭祖。<sup>①</sup>

直到近十几年,随着迁居霞浦县城和跨国移民的人口增多,通婚圈才逐渐扩大,但“原来不和霞浦人结婚”的说法仍被反复提及,作为区分“过去”和“现在”的重要标志。

在仪式与节庆层面,祖籍地长乐的民俗同样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作为北礮岛居民日常文化实践的参照。岛上居民在谈及婚丧嫁娶、祭祖或特定节日习俗时,往往会主动指出某些做法“是长乐的老规矩”,并以此与霞浦本地风俗加以区分。例如,闽东地区普遍保留在端午时节于门口悬挂艾草以辟邪祛毒的传统,但北礮岛居民会特别强调,他们用红纸包束菖蒲与艾叶并悬挂于门上的做法“是长乐的习俗”。在他们的叙述中,红纸包裹的方式、悬挂的位置,以及菖蒲被包成类似粽子形状的三角样式,都会被反复拿来与霞浦当地做法作对比,并被视为区分两地的重要标志。

对长乐的原乡认同还体现在频繁的往返实践之中。直到近年,北礮岛仍保留着前往长乐的船班。居民在谈及这一行程时,往往不说“去长乐”,而是习惯称之为“回家”,从而将祖籍地置于情感与身份的核心位置。不过,这种以长乐为核心的认同在不同代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年长一代而言,长乐不仅是祖籍意义上的来处,也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要来源;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祖籍记忆虽被保留,但在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度已明显降低。

30 岁的 CFD 表示:

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是长乐人,不管是风俗习惯还是语言,这和霞浦人是不一样的。但平时其实很少过去,就是知道那是我们的根。<sup>②</sup>

这些语言、婚姻与祭祀等实践表明,北礮岛移民的原乡认同并非仅停留在日常行为层面,而是深深嵌入其象征体系之中。通过族谱维系的血缘关系、以祖先为核心的祭祀仪式,以及围绕祖籍地展开的节庆实践,共同构成一种象征性联结。北礮岛居民的此类实践虽不直接带来现实利益,但在当地社会中被普遍视为应尽的文化义务。由此,宗族关系与祖先信仰不仅构成原乡认同的重要内容,也在更深层面维系着跨地域的情感与身份联结。

## (二)海外迁移与原乡认同重构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福州长乐地区较早出现规模化海外迁移,并逐步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形成相对稳定的移民网络。依托血缘、地缘与同乡关系构成的迁移链条,“出国”在当地社会中逐渐成为一条可被实践的生活路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北礮岛居民在长乐亲属的带动下陆续移民海外,并形成延续至今的出国潮。在初始阶段,北礮岛移民的跨国流动高度依附于长乐社会网络展开。无论是获取出国信息、筹措资金,还是抵达海外后的落脚与就业安排,长乐亲属均扮演着关键角色。从实践层面来看,长乐构成了北礮岛移民实现跨国迁移的重要依托。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4 年 10 月 8 日在北礮岛 SXJ 家中的访谈。

<sup>②</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4 年 3 月 23 日在霞浦县城 CFD 家中的访谈。

CQY是北礮岛最早去欧洲的海外移民,1994年他就在长乐亲属的帮助下迁徙到英国。CQY回忆道:

那个时候我看到长乐的亲戚去了美国之后,都能带钱回来,所以我也想出国试试。当时家里人找北礮还有长乐的亲戚一共借了20万,作为出国的费用。几经辗转我才到英国,最开始就是借住在长乐亲戚的家里,他又介绍我去长乐老乡开的中餐馆打工。<sup>①</sup>

在这一阶段,北礮岛移民的生活明显嵌入以长乐人为核心的移民社会之中,其就业路径、社会交往,乃至日常生活,均围绕祖籍地社会网络展开。

随着时间推移,较早出国的北礮岛移民逐渐在海外站稳脚跟,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经验。迁移链条也由最初完全依附长乐网络,开始向以北礮岛为单位的网络延伸。相较于通过长乐亲属间接出国,后续移民更多是由已经在海外的北礮岛亲友直接接应。

第二代移民JW在访谈中提到:

我们这代出去的时候,就不用再找长乐那边了,北礮先出去的人已经有条件了,也更亲。过去以后,吃住都有人管,心里也踏实。<sup>②</sup>

这一过程中,以北礮岛为基础的迁移网络由依赖长乐“关系”,逐渐发展为跨国迁移体系中的重要节点。

这一网络结构的变化,也在认同层面逐步体现出来。具体而言,以共同生活经验为基础的群体归属不断强化。与长乐所承载的祖籍象征意义不同,北礮岛更多关联于“从小一起长大”的共同经历,对它的认同更贴近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因此,在就业、居住与日常互助等情境中,北礮岛海外移民多以“北礮人”作为行动基础,而在涉及祖籍来源时,则转而指向“长乐人”,两者在实践中的功能存在明显差异。伴随这一变化,以“北礮”为名的同乡网络逐渐在海外形成,并通过聚会、互助等方式,将原有的岛屿关系在跨国空间中重新组织起来。北礮岛由此被持续指认,逐步进入移民的原乡认同结构,并与长乐形成并置关系。

与此同时,跨国迁移也推动了北礮岛移民家庭在国内生活安排的调整。随着收入的积累,不少海外移民的家属迁居霞浦县城,使县城成为移民家庭再生产与日常运作的主要承载空间,承担子女教育、老人照护及各类事务处理等功能。丈夫在美国的LJH早在几年前就搬到霞浦县城居住,她坦言:

孩子读书、老人看病,岛上不方便,住城关更现实。<sup>③</sup>

与长乐和北礮岛不同,霞浦并未嵌入既有的宗族关系与祖籍联系,而是通过日常生活实践逐步纳入移民家庭的生活空间。受访者在谈及霞浦时,多强调“方便”“实际”等因素,而较少涉及祖先或“来处”的意义。因此,霞浦在认同结构中呈现出情感联系较弱,但在日常生活中功能突出的特征。与此同时,北礮岛并未从移民的生活中退出,他们在端午、清明等特定节日会返回岛上。

总体来看,北礮岛海外移民的原乡认同并不只是跨国迁移的产物,而是在祖先迁居、岛上共同体生活、海外流动与国内生活重组的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从最初以长乐为单一指向,到北礮岛共同生活空间的形成,再到霞浦县城融入家庭生活体系,不同空间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叠加、分化与重组,共同构成北礮岛海外移民的复合型原乡认同。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9年3月24日对CQY的线上访谈。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4年10月9日在北礮岛JW经营民宿中的访谈。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3年2月10日在霞浦县城LJH家中的访谈。

### 三、复合型原乡认同的跨国实践逻辑

在北礮岛海外移民的跨国生活中，“原乡”并未停留于情感或记忆层面，而是持续嵌入具体实践之中，成为行动选择、关系运作与生活安排的重要参照。随着跨国迁移的展开，长乐、北礮岛与霞浦县城并非以静态并列的方式存在，而是在不同迁移阶段与具体情境中被不断调用，并在功能上呈现出差异化分工，由此共同构成一种可被操作与调整的行动结构。

#### （一）长乐：象征性原乡与跨国通道

在北礮岛移民的跨国实践中，长乐主要是以一种兼具象征性与通道性的原乡形态发挥作用。尤其在移民初期，它往往构成进入海外社会的关键入口，是由密集的宗族关系、亲缘网络与既有迁移经验共同支撑。对北礮岛居民而言，出国并非个人能够独立实现的选择。CXH 是北礮岛最早一批前往美国的移民之一，他在访谈中坦言：

以前别说霞浦了，整个宁德也没什么人出国，我们哪里知道有什么渠道能出国呀。<sup>①</sup>

在他们的经验中，掌握迁移路径与信息的主体，是早已在海外形成社会网络的长乐人。因此，当北礮岛居民产生出国意愿时，往往首先“回到长乐”，通过亲戚来获取信息、联系渠道并完成迁移准备。JFX 于 1998 年在长乐亲属的帮助下成功迁移至美国。据他回忆，当时家里看到长乐亲戚出国后不仅能寄钱回家，还帮家里盖起了新房，心里羡慕，也动了出国的念头。然而，请长乐亲属帮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是有姻亲关系的还好说一点，没有的话，很多也只能算远房亲戚。<sup>②</sup>

他提到，为了谈妥出国的事情，自己去了长乐很多次，带着礼物，托人引荐，反复沟通，最终才找到相对稳妥的渠道。这一过程表明，长乐不仅是祖籍地，更是被主动调动的迁移资源场。

这种通道功能也不能简单以“资源获取”来解释。在受访者的叙述中，长乐之所以成为首选路径，与深层的宗族关系网络与祖先认同密切相关。正如多位移民所言：“长乐是祖宗在的地方。”这种表述反复出现，使长乐在认同结构中具有超越现实功能的象征意义。族谱所维系的血缘谱系、关于祖先来源的口述记忆，以及对“从长乐来”的共同叙述，构成了一种被默认的身份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长乐出去”不仅意味着进入既有的迁移体系，同时也被理解为在宗族谱系中的一种延续。

在具体实践中，北礮岛海外移民并非被动地跟随长乐人出国，而是在反复权衡风险与可能性的基础上，选择通过嵌入长乐移民网络来完成跨国迁移。除移民渠道外，在筹措出国资金时，他们往往需要同时动员北礮岛与长乐两地的社会网络。

CMX 回忆道：

我是 2001 年去的美国，当时需要 50 多万，岛上能借的基本都借了，还找长乐的亲戚借了一些。<sup>③</sup>

在这一阶段，长乐不仅是祖籍地，更在实践层面成为掌握关键信息与社会资本的资源中枢，其资源功能与象征意义相互交织。

多位北礮岛移民在访谈中提到，初到海外时，几乎都会先借住在长乐亲戚家中。住宿问题暂时解决之后，谋生路径同样高度依赖这一网络。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多由长乐亲属或老乡代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0 年 8 月 7 日对 CXH 的线上访谈。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3 年 1 月 31 日在霞浦县城 JFX 家中的访谈。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7 年 9 月 9 日在北礮村委会进行的座谈会。

为介绍,主要是去长乐人经营的中餐馆及相关行业打工。JQ于2003年到英国,他回忆自己初到英国时的生活颇为艰难:

刚过去的时候,先是住在长乐亲戚家里,等找到工作了,才搬到中餐馆楼上住。<sup>①</sup>

那是一间狭小阴暗的隔间,既是居所,也是餐厅的杂物间。由于当时尚未取得合法身份,又语言不通,他几乎不敢单独外出,日常生活高度依赖身边的长乐老乡。他提到,从日常采买到如何应对移民政策变化、办理身份合法化手续,几乎都离不开长乐人的指引与协助。在他的叙述中,尽管已身在海外,但日常生活仍然被包裹在一个以长乐人为核心的社会圈层之中。

感觉人到了国外,可日子还是在长乐人里过。<sup>②</sup>

这种以祖籍地网络为中心展开的生活方式,在第一代移民中尤为典型,他们的跨国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北碚岛移民并未将融入海外长乐人圈子理解作为一种被迫或策略性的选择,而更将其视为顺理成章的结果。在北碚岛海外移民的自我认知中,他们本就是“长乐人”,与直接从长乐出国的移民并无本质差异。基于这种身份认同上的自明性,加之在语言、日常生活方式与祖籍记忆等方面的高度重合,他们得以较为顺畅地嵌入以长乐人为核心的海外社会网络。随着迁移链条的延伸,这种以长乐为中心的依附关系在第二代移民中虽有所弱化,但其作为祖源地的象征意义仍然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长乐的象征与实践功能进一步凸显:它不仅在现实层面为北碚岛海外移民提供了住宿、就业与信息等支持,也作为被反复确认的身份来源,在陌生的跨国环境中提供稳定的认同参照。尤其在跨国迁移初期,“作为长乐人”的身份通过日常实践被不断强化,使长乐作为祖籍地与出国通道的双重意义不断被确认,并在复合型原乡认同结构中构成最基础的“根”层次。

## (二)北碚岛:实践性原乡与情感锚点

随着时间推移,原乡指向逐渐由以长乐为中心的单一结构转向多重并存的复合形态。部分较早出国的北碚岛移民在海外站稳脚跟后,开始引领北碚岛亲友出国,使原本依附长乐的迁移链条逐步叠加上以北碚岛为核心的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北碚岛不再只是跨国迁移前的居住地,而被重新识别并投入为一种需要不断“做出来”的实践性原乡,成为移民在跨国生活中持续建构与情感投注的重要指向。这一转变在不同代际之间尤为明显:相较于早期移民对长乐通道的依赖,后续移民更倾向于以北碚岛作为跨国迁移的依托与行动基础。

在瑞士生活了二十多年的SXD,回忆起刚到海外的那几年,他反复用“顾不上”来形容当时的状态:

那时候哪里还想得到岛上,一天十几个小时在餐馆干活,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多赚点钱,尽快把债务还上。<sup>③</sup>

在他的记忆中,北碚岛虽然是自己的家乡,却并未进入当时的现实考量,更谈不上反哺岛屿建设。这种状态,往往随着海外生活逐渐步入正轨而发生变化。当工作趋于稳定、经济压力有所缓解,一些移民开始重新将注意力投向岛屿本身。这种转向并非源于明确的外部动员,而更像是在跨国生活节奏中自然浮现的情感回流。

<sup>①②</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4年10月12日在北碚岛JQ家中的访谈。

<sup>③</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1年12月5日对SXD的线上访谈。

在美国定居多年的 CYH 提到：

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开始想，岛上现在怎么样了，公共设施有没有改善，生活是不是还是那么不方便。<sup>①</sup>

正是在类似的念头推动下，他开始主动参与海外北礮同乡之间的联络，并逐渐介入一些与岛屿事务相关的集体行动。这种由“顾不上”到“主动参与”的转变，也标示出北礮岛在原乡认同结构中由背景性存在向核心指向的转移。

这种情感回流，首先体现在对北礮岛公共事务的实际参与上。随着北礮岛海外移民人数的增加，以“北礮”为名的同乡组织逐渐在海外形成，并开始承担起集资、协调与联络的功能。其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反哺岛屿的建设。多位村干部都反复提到，岛上一些较为重要的公共设施项目，几乎都离不开海外移民的支持。例如，村内道路的修整、公共照明条件的改善，均是在海外同乡会的推动下逐步完成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太阳能路灯项目。该项目总投入资金达五十余万元，由英国、美国的北礮同乡会牵头，发动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乡亲共同参与募捐。参与过募捐协调的移民 JCX 回忆，当时并未设定明确的捐款标准，只是将消息发布出来，大家便陆续响应，捐款金额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最终，所有捐赠者的姓名被刻在石碑上，立于北礮岛最高处的观景平台旁。

做捐赠芳名录并不是比谁出的钱多，而是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是我们海外北礮人一起做的。<sup>②</sup>

在他看来，这种集体署名本身，就是对“北礮”这一共同身份的确认。类似的集体行动，也出现在宗教场所等公共活动空间的修建中。北礮岛海云寺的修复工程，总费用达六七十万元，其中大部分同样来自海外移民的捐赠。长期居住在岛上的老人 CWQ 对笔者感慨道：

这些事情，要是没有他们在外面的人，哪里有办法做。<sup>③</sup>

在这些反复出现并被记忆的公共行动中，“为北礮做事”逐渐从个体行为转化为一种被认可，也被期待的集体实践。海外移民通过捐资修缮宫庙等方式，将经济投入转化为象征性的联结，强化与原乡的精神关系。同时，围绕宫庙修缮与节庆祭祀展开的集体活动，也不断巩固北礮作为共同体的意义。这类有关共同体信仰的实践虽不直接指向现实收益，却在跨国分散的情境中维系着对“同一来源”的持续确认，使北礮岛在原乡认同结构中获得超越功利的稳定地位。

与此同时，北礮岛作为实践性原乡的意义，也体现在迁移链条内部的变化之中。随着北礮岛早期移民在海外站稳脚跟，他们开始主动帮助岛内亲属、同村后辈出国。有着迁移瑞士经历的年轻人 JST 直言：

我们这一代人出国已经方便多了，日子也好过多了，出去都是找我们北礮的人，管吃管住，等到彻底独立了再搬出去都可以。<sup>④</sup>

这种“带人出国”的行为，在北礮岛海外移民看来并非单纯的个人选择，而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对家乡的责任与回馈，同时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以北礮为单位的网络关系。迁移网络的重心随之开始从依附长乐，转向以北礮岛为核心重新组织，并在后续移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近年来，随着北礮岛因独特的海岛风光在网络平台上走红，这种实践性原乡认同又呈现出新的表达形式。一些年轻的海外移民开始选择短期或阶段性返乡，参与到岛屿旅游相关事务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3 年 2 月 1 日在霞浦县城 CYH 家中的访谈。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1 年 11 月 23 日对 JCX 的线上访谈。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7 年 9 月 13 日在北礮岛老年活动中心对 CWQ 的访谈。

④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3 年 1 月 29 日在霞浦县城 JST 家中的访谈。

中。有的回乡经营民宿,有的协助协调交通接驳,还有的尝试推动“跳岛游”等项目。与外来资本主导的开发不同,这些返乡实践更强调合作而非竞争。从英国回来的北礮青年 CBS 在访谈中反复提到:

岛上人本来就不多,要一起做,把口碑和名声做起来,不能各搞各的。<sup>①</sup>

他们会主动与岛上居住的老年人协商分工,让其参与简单的接待或后勤事务,使旅游发展尽量与社区生活结合在一起。这种实践不仅是经济参与,也是一种对地方关系与共同体秩序的再生产。通过这些反复发生的行动,北礮岛在海外移民的认同结构中被逐步“做实”。它不再只是一个海外移民的出发地,而是在捐赠、建设、迁移引领与返乡实践中,被持续投入情感、资源与象征意义的对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北礮岛逐渐成为海外移民跨国生活中的情感锚点——一个即便不常居住,却始终被惦记、被维护,被赋予责任的地方。相较于早期依附长乐网络的移民,后续移民在海外更倾向于通过北礮同乡关系展开互动,这也使北礮在其原乡认同结构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并逐渐由“背景性家乡”转变为最具凝聚力的认同核心。

### (三) 霞浦县城:制度性原乡与生活枢纽

相较于长乐与北礮岛,霞浦县城在北礮岛移民的原乡认同结构中呈现出一种更为现实,却同样不可或缺的形态。它既不是祖籍意义上的“来处”,也并非情感与记忆高度凝聚的象征性家园,而是在跨国迁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移民家庭在国内的生活中心与制度节点。从这一意义上说,霞浦并非一个“被继承”的原乡,而是一种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被一步步“用出来”的原乡,并在代际更替中不断强化其重要性。

这种转变首先表现为海外移民家属的生活空间逐渐由岛屿转向县城。早期海外移民出国之后,岛上不少老人仍选择留守北礮岛生活。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岛屿生活的结构性限制开始变得愈发难以回避。医疗资源匮乏,交通条件受天气影响,一旦发生突发状况,岛上居民往往难以及时应对。七十多岁的老人 SMZ 曾向笔者讲述自己最终搬离北礮岛的经历:

以前我是不愿意出来住的,总觉得北礮才自己的家。但有一次半夜肚子痛得厉害,岛上没有医生,也没船,只能硬撑到天亮,才送出去。那一次之后,家里人就不让我住岛上了。<sup>②</sup>

类似的经历在访谈中并不少见。对许多老人而言,看病不便、突发状况难以被及时救援,加之子女长期旅居海外,使得原本被视为“终老之地”的岛屿,逐渐显露出其难以承载晚年生活的现实困境。

与老年人身体状况的变化几乎同步,移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考量也成为搬离岛屿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岛上小学因生源不足而停办,适龄儿童从小学阶段起便必须前往霞浦县城就读。为了让孩子进入条件更好的小学和初中,一些家庭甚至在县城购买学区房,由母亲或其他家属陪读。这一阶段,家庭成员往往分散在不同空间之中。既要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孩子,又难以放下住在岛上的老人,成为不少人面临的现实困境。JF 已经在霞浦县城生活十余年了,她回忆道:

最开始孩子在城关读书,我就陪着住在县城,老人还在岛上。我两边跑,今天在城关,过两天又要回岛上看看,真是很累。<sup>③</sup>

最终,不少家庭选择通过整体搬迁来缓解这种张力。在反复权衡之下,他们往往会劝说老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4 年 10 月 8 日在北礮岛 CBS 经营民宿中的访谈。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3 年 2 月 3 日在霞浦县城 SMZ 家中的访谈。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7 年 9 月 13 日在北礮岛老年人活动中心对 JF 的访谈。

人搬离岛屿到县城一起生活。正如另一位侨眷 WY 所说：

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人都要跑垮了，就干脆一起搬出来，老人一开始是不太愿意的，慢慢也就想通了。<sup>①</sup>

随着老人、子女等相继迁入县城，北礮岛海外移民在国内的生活重心也完成了从岛屿向县城的转移，而这一转移在年轻一代的移民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普遍。

季节性迁移的节奏，同样加深了霞浦作为生活枢纽的功能。每年入冬后，闽东沿海风浪增大，台风和寒潮频繁，北礮岛生活条件明显恶化。从 11 月开始，岛上逐渐“空下来”，大多数家庭都会提前搬往县城。多位受访者提到，北礮岛冬天基本没人居住，即便是常年留守的老人，也会被家人接到城关过冬。春节期间，岛上往往人去屋空，热闹的团圆场景转而集中在霞浦县城的住宅小区中。这一空间转移在海外移民群体中尤为突出：他们春节回国，与家人团聚的地点几乎无一例外选择在霞浦县城，而非北礮岛。旅居意大利英国多年的 JS 直言：

冬天上岛不方便，回去了也待不住，大家都在城关。<sup>②</sup>

在他们的时间安排中，北礮岛更多被保留给清明、端午等具有明确仪式意义的节点，而春节这一最具家庭意义的节日，则牢牢嵌入县城生活之中。

在瑞士出生的 JHQ 谈到自己的“家乡”时显得有些犹豫。他说，在国外长大，一直知道自己“是长乐人”，也知道家里是“从北礮出来的”，这些说法在父母与同乡的日常谈话中反复出现，但对他而言，这些地方更多停留在一种被告知的身份之中，而缺乏直接的生活经验。偶尔跟随父母回国，他通常也是与家人一起住在霞浦县城，很少有机会上岛，对北礮的印象也较为模糊。<sup>③</sup> 在他的认知中，“长乐”和“北礮”更像是通过家庭叙述被继承的象征性来源，而霞浦则是通过身体经验与日常实践被直接感知的生活空间。这种差异显示，新一代移民的原乡认同正在从以历史叙述与血缘传承为核心的“被讲述的来源”，转向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被体验的空间”。对他们而言，祖籍地与传统意义上的“原乡”并未消失，而是更多以象征性身份存在；相较之下，现实生活所嵌入的居住空间在认同结构中占据更直接的位置，原乡的意义也越来越取决于是否进入日常生活实践。

正是在这些看似琐碎、却不断重复的生活选择中，霞浦县城逐渐嵌入北礮岛移民的原乡认同结构。它并未取代北礮岛在情感与象征层面的意义，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持续承载，成为家庭运转不可或缺的现实空间。县城是“住的地方”“办事的地方”“过日子的地方”，这一认知在实践中被不断强化。作为一种制度性与生活性的原乡，它为跨国移民家庭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国内生活支点，使多重空间之间的生活秩序得以延续。

总的来说，北礮岛海外移民原乡认同的内涵既有功能性的生活安排或资源配置逻辑，又进一步嵌入更为深层的社会与文化机制之中。在北礮岛海外移民的日常生活与跨国实践中，宗族关系、祖先祭祀与民间信仰同样构成原乡认同的重要基础。例如，清明返乡祭祖的仪式实践，以及对岛上神庙的集资修缮，均体现出超越现实功利的象征性联结。这类以宗族与信仰为核心的认同形式，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跨代际延续性，并支撑着资源网络的运作。相较而言，资源性功能更多表现为这一认同结构在具体实践中的外在展开。

综合来看，长乐、北礮岛与霞浦在移民的原乡认同结构中，分别对应不同的功能：长乐作为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3 年 2 月 4 日在霞浦县城 WY 家中的访谈。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3 年 2 月 1 日在霞浦县城 JS 家中的访谈。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1 年 9 月 15 日对 JHQ 的线上访谈。

祖籍地,承载着深厚的宗族记忆与象征意义,是指向“根”的来源;北礮岛作为长期共同生活的空间,是群体认同与情感归属的核心,构成“本”的层次;而霞浦则是在移民归国后的现实生活中心,并在制度与日常实践中发挥着维系运作的功能,体现为“用”的层面。三者之间不仅呈现出功能上的分化,也构成了由“象征来源—情感共同体—现实生活依托”所展开的结构关系。

在这一结构之上,不同代际由于进入迁移体系的时间位置与经验路径不同,其对三个原乡的依赖与使用方式也呈现出差异:早期通过长乐网络实现跨国迁移的北礮岛海外移民,他们的认同更倾向于祖籍地;随着北礮跨国社会网络的形成,后续移民更强调以北礮为基础的同乡联系;而成长于霞浦县城或出生于海外的新一代,则更多倾向于原乡与自身现实生活空间,使霞浦在认同结构中的实际意义不断上升。从更深层的机制来看,代际差异并不仅仅表现为对不同原乡的偏好变化,而是源于其在迁移链条中所处位置的结构不同:第一代移民是在缺乏既有路径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长乐网络完成跨国迁移,因此其原乡认同更集中于能够直接提供资源与象征意义的祖籍地;而随着跨国迁移网络逐步在北礮岛内部固化并扩展,后续移民更多是依靠群体内部提供的路径“进入”海外社会,其认同重心随之转向能够直接支撑日常生活与互助关系的北礮同乡网络;对于在县城或国外长大的新一代而言,由于其成长经验本身已经嵌入霞浦县城乃至海外生活场景之中,原乡不再主要作为“来源地”被理解,而是作为日常生活的延伸空间被加以整合。由此,原乡认同并非均质存在,而是在代际位置与迁移经验的交织中持续发生调整与重组,在资源、情感与象征等多重维度中形成差异化的认同实践。

#### 四、复合型原乡认同的情景化表达

对北礮岛海外移民而言,“我是哪里人”并非一个固定或单一的身份陈述,而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认同表达。在不同的社会场合、交往对象与制度语境中,他们会有选择地调用“长乐人”“北礮人”或“霞浦人”,以回应具体的互动需要、建立社会关系或满足外部制度与话语的期待。这些地方指向不是互相排斥的竞争性认同,而是在具体互动情境中被灵活切换、并置,乃至叠加,进而共同构成复合型原乡认同的外在呈现形式。

##### (一)海外华人社会中的“长乐人”

在海外生活语境中,北礮岛移民最常使用且最具解释力的身份表述依然是“长乐人”。这一选择并非否认他们来自北礮岛,而是受到海外华人社会的分类方式、互动规则和资源结构的影响,展现出一种策略性的身份表达。

多位较早出国的北礮岛移民回忆起初到海外的经历时,常提到一个日常场景:刚开始在长乐人开的中餐馆打工,与工友或新认识的同乡聊天时,常常被问到“你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并不在正式场合提问,而多发生在厨房后门抽烟的间隙或下班后聚在一起吃宵夜时,成为关系熟络的起点。在这种情境下,“从哪里来”并不是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而是一种快速定位彼此关系的方式。曾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JYH回忆道:

我当时到长乐老乡的餐馆工作,当时还有几位工友,也都是长乐人,就会问我是哪里的,我就说自己是来自(长乐)金峰的,因为如果说自己是北礮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还得解释,是在霞浦的一个岛上,是祖先迁过去的,就非常麻烦。一说金峰,他们马上就知道了,然后就会问认不认识某某,有没有在他店里做过。<sup>①</sup>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9年3月7日对JYH的线上访谈。

这种交流方式在多个受访者的叙述中反复出现，长乐成了一个无须进一步解释、能迅速理解的标识。而“北礮岛”通常是在关系熟络后才提及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先说长乐老家”逐渐成为自然而然的习惯。这种语言表达方式逐渐在海外日常生活中被强化，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交流方式。

在当代海外华人社会中，原乡不仅指向个体的地理来源，更演变为“华侨华人”群体中的细分标识，形成不同地方背景的区分。例如，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闽南人、温州人等，通常被赋予特定的经济特征和行业分布，并在海外社会中形成可识别的群体。尤其在美国、英国等主要的新移民接收国，福州籍移民数量庞大、网络成熟，在餐饮、物流、零售等行业展现强大经济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作为福州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乐人”在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中已形成一种带有明确社会含义的身份认同。

对北礮岛移民而言，在海外以“长乐人”进行自我表述，首先是一种降低社交成本的现实策略。在陌生的移民社会中，这一身份能够迅速为对方提供关于来历、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判断，从而决定是否展开进一步互动。在英国纽卡斯尔经营中餐馆多年的北礮岛移民 JXW 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谈道：

英国的福州移民也很多的。我一开口讲的是福州话，再说自己是长乐的，对方就觉得很亲近，沟通起来也容易很多。<sup>①</sup>

这种基于籍贯的即时识别，使“长乐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具有明显的辨识度与亲近感。

更为关键的是，“长乐人”这一身份在海外并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是直接关联着社会资源。多位受访者在回忆初到海外的经历时都提到，落脚之初几乎无一例外是先借住在长乐亲属或同乡家中，再由对方牵线进入中餐行业。20世纪90年代初赴英的 STY 回忆：

刚到英国那会儿，人生地不熟，是和一个长乐的远房亲戚住一起，他也在长乐人开的中餐馆打工。老板就问我不要先到他这里做，正好都是老乡。<sup>②</sup>

在这一过程中，籍贯并非抽象的身份标签，而是一种能够被识别和信任的社会线索，成为新移民进入特定行业网络的重要“敲门砖”，帮助他们迅速嵌入既有的海外华人社会结构之中。

与此同时，这一身份表述还具有清晰的分类功能。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内部，不同来源地的群体往往首先通过籍贯加以辨识，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交往边界。即便同属福州籍移民，长乐人与连江人之间也常被明确区分，资源获取与社会互动中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有着多次移民经历的 JQ 向笔者讲述，他在移民途中就亲历过同船的长乐人与连江人因物资分配发生冲突的情形，而他本人则“很自然地就站到了长乐人那一边”。<sup>③</sup> 在这样的互动逻辑下，“长乐人”不只是一种籍贯标签，更是一种在反复实践中被验证、具有可预期性的身份指认。

## (二) 跨国网络内部的“北礮人”

如果说“长乐人”是北礮岛海外移民在华侨华人群体中所采用的一种对外身份标识，那么“北礮人”的称谓则主要用于群体内部，更侧重强化凝聚力与共同体意识。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北礮岛移民往往需要借助“长乐人”这一更具可识别度的身份来介绍自己、建立联系；然而，在由北礮岛移民自身构成的跨国社会网络内部，“北礮人”并不是一个需要被反复说明或刻意强调的身份标签。它更像是一种默认存在的前提，渗透在日常交往的方式之中，却很少被直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8 年 7 月 13 日对 JXW 的线上访谈。

<sup>②</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0 年 4 月 22 日对 STY 的线上访谈。

<sup>③</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4 年 10 月 12 日在北礮岛 JQ 家中的访谈。

接说出口。

英国北礮同乡会会长JTM在访谈中就明确提到,北礮岛海外移民聚在一起时,不会有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北礮哪个村的”。在他看来,这样的说法反而显得多余。

大家坐下来,肯定不会讲这个,一开口聊的就是最近生意怎么样、工忙不忙、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或者岛上最近又有什么变化。<sup>①</sup>

对他而言,是否是“北礮人”从来不是需要被确认的问题,而是早已被默认的共同背景。现年30岁的北礮青年JHX在回忆自己早年独自在瑞士生活的经历时,也以极为具体的方式描述了这种感受。他说:

我以前在瑞士的时候很无聊,很苦闷的时候就会去找我们北礮的人去玩。也不用担心什么方不方便,直接就去了,不用说什么,相互之间都懂。<sup>②</sup>

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无须铺垫的往来,让他在异国他乡获得了一种可以依靠的情感空间。他最后补了一句:

如果在瑞士没有他们,我会感到很孤独。<sup>③</sup>

在JHX的叙述中,“北礮人”并不是一种需要被明确宣示的身份,而是一种可以直接进入的关系状态。正因为彼此共享相似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和出国经历,他才能在情绪低落时不加犹豫地“去找北礮的”。这种“无需说明”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北礮人”这一身份缺乏意义。相反,它往往在关键时刻被轻声提及,却能够迅速发挥作用。当笔者询问JXS在英国时,为什么愿意照顾一名北礮年轻人,让他住在自己家中将近半年,他只是摆了摆手,说道:

都是北礮的,还有什么好讲的。<sup>④</sup>

在涉及照应、帮忙或承担责任的情境中,一句“都是北礮的”,往往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要做”。

随着北礮岛海外移民人数的增加,受访者也开始频繁提到,单靠个人之间的照应已经难以应对越来越多的事务。SWD在回顾早年情况时说道:

以前人少,谁有事,打几个电话就行了,后来人多了,事情也牵扯到岛上、牵扯到钱,就不能再只是私下帮忙了。<sup>⑤</sup>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北礮人”开始被更明确地说出来,并被用作组织行动的理由。北礮美国同乡会会长JSD在谈及成立同乡会的初衷时,也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他指出:

我们北礮虽然通过长乐的亲戚到了海外,但是想站稳脚跟,发展得更好,始终还是要靠我们北礮自己人。<sup>⑥</sup>

在他看来,单独成立北礮同乡会,并不是为了与其他长乐移民区分高低,而是出于实际操作层面的考虑。

特别是遇到北礮岛的事,如果不建立同乡会,只是依靠在长乐人里面,很多事情也没办法做。我们过得好了,有实力了,当然要成立我们自己的同乡会。<sup>⑦</sup>

在JSD的讲述中,“北礮人”被不断用来界定行动的对象与范围:哪些事情是“我们该管的”,哪些责任是“北礮人”的责任。这种以原乡为核心的身份表述,使得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北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0年6月15日对JTM的线上访谈。

②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4年10月11日在北礮岛JHX经营民宿中的访谈。

④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3年2月1日在霞浦县城JXS家中的访谈。

⑤ 资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9月9日在北礮村委会进行的座谈会。

⑥⑦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3年2月2日在霞浦县城JSD家中的访谈。

礮岛移民能够在具体事务中迅速形成共识，也为集体投入提供了正当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北礮人”的表述越来越与“把北礮建设好”的集体想象紧密结合。在岛屿具备发展文旅条件的背景下，“北礮要怎么做”“北礮未来可以成为什么样”已成为北礮岛海外移民交流中频繁出现的话题。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共同体意识通过多种方式得以体现：集资修缮公共空间、设计游客参观路线、讨论如何提升岛屿的亮点与特色等。这类实践表明，“北礮人”的认同正在从单纯的血缘或地缘纽带，逐步延展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集体责任感。

### （三）制度语境中的“霞浦侨”

与前两种移民主动调用的身份表述不同，“霞浦”作为一种原乡叙事，更多是在制度性与官方话语中被反复使用和确认的。在侨务工作、政策阐释与地方形象建构等正式场合，北礮岛海外移民往往被整体性地表述为“霞浦侨”或“霞浦华侨华人代表”，并由此被纳入县域，乃至市域层级的侨务体系之中。宁德市只有古田县在近代以来形成了少量的海外移民，而随着北礮岛海外移民规模的持续扩大，霞浦县逐渐成为宁德市最为突出的海外移民输出地。北礮岛所形成的跨国移民网络，不仅改变了霞浦在地方侨务版图中的位置，也使其在制度叙述中被逐步塑造成“宁德侨”“霞浦侨”的重要代表，从而被纳入“新兴侨乡”的话语建构与治理实践之中。需要指出的是，“霞浦侨”这一表述，并非主要源于移民日常交往中的自我表达，而更多是在侨务工作及地方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归类方式。在这种表述中，来自不同祖籍地、具有不同迁移经历的移民群体，往往被纳入以县域为单位的框架之中，并在对外场合被概括为相对一致的群体。对北礮岛移民而言，“长乐人”或“北礮人”等身份更多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生活实践之中，而“霞浦侨”则主要出现在官方或其他公共事务场合。因此，与前文所呈现的原乡认同实践相比，这一表述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认同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

“霞浦侨”的身份定位，首先体现在各级侨务部门组织的正式活动与交往场景中。英国北礮同乡会会长 JTM 在访谈中提到，近年来他多次以霞浦县华侨代表的身份，受邀参加县、市级侨务部门的联谊活动和节庆仪式。他回忆道：

其实我们在外面一直都只说自己是“长乐人”或者“北礮人”，很少会说自己跟霞浦有什么关系。但回国参加活动，主持人介绍的时候，就变成“来自宁德霞浦的华侨代表”，一开始还挺不习惯的。<sup>①</sup>

类似的经历也出现在其他北礮岛移民身上。北礮美国同乡会会长 JSD 回忆自己参加宁德市组织的侨商侨领春节联欢活动时，市委领导在发言中特别提到北礮岛海外移民，称其为“宁德非常宝贵、也很有特色的一支华侨力量”，并鼓励他们“多为家乡发展牵线搭桥”。<sup>②</sup> 在这一情境中，北礮岛海外移民不再是以个人或岛屿为单位出现，而是被整体性地纳入地市华侨代表的序列之中。

省级侨务部门，同样在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在参与福建省侨联组织的学术交流与调研活动时，曾多次听到侨联干部谈及北礮岛海外移民。有工作人员私下说道：

现在说到宁德的“侨”，基本上就会提到霞浦北礮岛。他们那一批人很有意思，很有特点。尽管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但回来的时候还是能一眼看出来，特别朴素，皮肤黝黑黝黑的，还保留着那种岛民的样子。<sup>③</sup>

这种带有鲜明身体与气质描述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将北礮岛海外移民塑造成一种可识

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0 年 6 月 15 日对 JTM 的线上访谈。

②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23 年 2 月 2 日在霞浦县城 JSD 家中的访谈。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 2018 年 1 月 26 日福建省侨联到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所交流时对省侨联工作人员的访谈。

别的华侨类型,并强化了其作为“宁德侨”“霞浦侨”的象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北礮岛海外移民而言,“霞浦侨”这一身份并非对原有认同的替代,而更像是一种在制度场域中被动接受、逐渐习惯的表述方式。北礮岛海外移民已经可以在“自己心里怎么认”和“对外怎么说”间自如切换。正如JQ所言:

我们自己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长乐的,但在外面人家叫你“霞浦侨”,其实也没错,因为你户籍是霞浦的。<sup>①</sup>

在侨务资源配置、政策对接和行政管理均以县域为基本单位的制度结构下,北礮岛海外移民被自然地归入“霞浦侨”的范畴之中。侨汇的回流、侨眷在霞浦县城居住,以及子女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现实安排,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与霞浦这一行政空间之间的制度性联系。正是在这一持续的互动过程中,“霞浦侨”逐渐从一种外部命名,转化为北礮岛海外移民可以接受,并在特定情境中加以使用的身份位置。

由此可见,北礮岛海外移民的原乡认同并非仅停留于观念层面,而是在跨国流动、日常生活与仪式实践中被持续表达与再生产。无论是同乡网络的互动、节庆与祭祖活动,还是对原乡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些实践均使不同原乡在具体情境中获得差异化呈现。也正是在这些具体行动之中,不同原乡被持续调动并嵌入差异化的互动情境之中,从而在跨国流动与日常生活之间不断获得新的表达形式。无论是在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以“长乐人”建立联系,在同乡网络内部以“北礮人”强化凝聚,还是在制度语境中以“霞浦侨”参与官方互动,这些身份表述均指向同一认同结构的不同侧面。由此可以看出,复合型原乡认同并非内在一致、稳定不变的整体,而是在具体社会关系与制度语境中被差异化调用与情境化表达的结果。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闽东沿海新兴侨乡北礮岛海外移民为个案,讨论了一种在当代跨国迁移语境中具有代表性的原乡认同形态——复合型原乡认同。研究发现,祖籍福州长乐、定居宁德霞浦北礮岛的海外移民群体,在祖先迁居历史、持续跨国流动与不同社会情境交织中,逐渐形成了由长乐、北礮岛与霞浦县城共同构成的多重指向原乡认同结构。

在具体运作过程中,这一结构呈现出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化:长乐主要作为祖籍地与跨国迁移通道被持续调用,北礮岛构成情感锚定与同乡网络运作的实践基础,霞浦县城则承担制度嵌入、家庭运作与归国后日常生活的现实支点。三者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在不同社会情境中被选择性激活,并通过差异化方式加以实践与表达:在海外华人社会中,“长乐人”构成可识别的身份标签;在同乡网络与迁移互动中,“北礮人”成为维系关系的重要资源;在制度语境中,“霞浦侨”则逐渐获得正式化身份确认。正是这种多重指向的并置与转换,使北礮岛海外移民得以在不同社会场域中实现灵活调适,并维持相对稳定的身份结构。

从结构内部来看,这一复合型原乡认同并非均质,而是在认同强度与情感层级上呈现差异。长乐作为祖籍地,承载族谱记忆、祖先祭祀与语言传统,是被反复指认的“根”,在象征层面最为稳定;北礮岛以长期共同生活经验为基础,构成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核心认同单位;霞浦县城则在教育、医疗与家庭再生产等制度需求推动下被纳入,其认同更多建立在现实实践之上。

<sup>①</sup> 资料来源于笔者2024年10月12日在北礮岛JQ家中的访谈。

由此,不同原乡之间形成“象征来源—情感共同体—现实生活依托”的层级结构,并在具体情境中不断被调动与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结构并非自然形成,而与移民进入迁移过程的时间与位置密切相关。不同代际在迁移链条中的起点、路径及其所依赖的社会网络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其对原乡的理解与使用方式。早期北礮岛海外移民主要依赖长乐关系网络实现跨国流动,其认同优先指向祖籍地;随着北礮岛移民网络自身的发展,后续移民逐渐强化以北礮为基础的乡网络;而成长于霞浦县城或出生于海外的新一代,更倾向于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关联,使原乡认同呈现出由祖籍地向归国后的现实生活地转移的趋势。由此,代际差异不仅体现为认同强度的变化,更表现为不同原乡在认同结构中功能位置的转移。

更为重要的是,复合型原乡认同不仅体现为多个空间地点的并存,也体现为不同维度认同的交织。在北礮岛海外移民的实践中,原乡既是获取出国机会、就业信息与社会支持的资源网络节点,也是通过族谱、祭祖与宗教仪式维系的象征共同体,同时还是承载情感记忆与归属体验的意义空间。资源性功能、宗族结构与情感认同并非彼此分离,而是相互嵌套;现实中的借贷、就业与信息流动依托血缘与地缘关系展开,而对祖先与宗族的认同则为跨地域网络的持续运作提供支撑。由此,资源性功能更多体现为原乡认同在实践层面的外化,而其持续性则依赖于更深层的象征与情感结构。

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复合型原乡认同”,既指向多重空间的叠加,也指向多重认同逻辑的交织,即工具性、情感性与象征性在具体实践中的统一。这一分析并非否定既有研究关于原乡认同流动性与建构性的论述,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内部结构及其形成机制。北礮岛的经验表明,在跨国流动发生之前,祖先的迁移历史已塑造出对原乡的认知,而跨国实践及归国后生活重心的转变,进一步生成了多重原乡结构,使原乡认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层次性与动态性。

从更广泛的经验层面看,这一现象并非孤例。在当代中国新兴侨乡及跨区域流动人群中,类似的多重原乡指向亦不同程度存在。例如,义乌虽非传统侨乡,但在小商品国际贸易的带动下,逐渐成为部分移民家庭在国内的生活中心,并在跨国迁移中被赋予类似“原乡”的情感与功能意义。义乌的迁移主要以个体或核心家庭为单位展开,并通过嵌入全球贸易网络与地方建立联系;而北礮岛则以宗族与群体为基础,在更长时段的迁移链条中逐步积累并固化为稳定的地方社会关系。中国新兴侨乡的这些经验表明,在持续流动的背景下,祖籍地、移民前的定居地与归国后的生活中心往往并不重合,从而使原乡认同呈现出多重化的发展趋势。

总体而言,基于北礮岛海外移民的实践,本文从祖先迁居历史与当代跨国流动出发,重新理解原乡认同的生成机制及其运作逻辑。研究表明,原乡认同是在历史迁居基础与持续跨国实践及空间重组的交织中形成的复合结构,既包含多重空间指向,也体现多种认同逻辑的交织,并在不同情境中被选择性调动与实践。这一视角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华侨华人认同结构的理解,并为从多阶段迁移经验出发重新审视原乡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

〔责任编辑 刘海涛〕

ry outside their own ethnic group. Over the past seventy year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ffect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ethnic regions has exhibited a U-shaped trajectory, weakening initially and then strengthening across successive birth cohorts.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policy and practical levels, it also offer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fostering a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Keywords:** inter-ethnic marriag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cohort variations; ethnic areas of Yunnan.

### **Composite Homeland Identification: A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Overseas Migrants from Beishuang Island in Eastern Fujian**

..... **Tong Ying** (60)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an overseas migrant community originally descended from Changle, Fuzhou, and later settled on Beishuang Island, Xiapu, Ningde.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migratory circumstanc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is community has developed a form of composite homeland identification grounded in multiple place-based attachments through processes of multi-stage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mobility.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migration, migrants from Beishuang Island often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people from Changle” and relied on ancestral-place social networks to facilitate incorporation into overseas societies. After establishing themselves abroad, they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 locality-based sense of belonging centered on Beishuang Island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hometown associations, while 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chain migration. As family members increasingly relocated to Xiapu County Town, it gradually became the principal living space for migrants returning to China. Homeland identif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Changle, Beishuang Island, and Xiapu County Town did not replace one another; rather, they were selectively activated in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forming a composite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is structure, Changle embodies ancestral memory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Beishuang Island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Xiapu County Town corresponds more closely to practical needs of everyday life. These multiple homeland orientations exhibit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in intensity and are continually reconfigured across generations; first-generation migrants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Changle as a symbolic “root” and migration conduit; later migrants strengthen a Beishuang-centered communal identity; while younger generations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plac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own lived experiences and everyday life. More broadly, composite homeland identification reflects not only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spatial attachments but also the intertwining of resource networks, kinship relations, and emotional belonging.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homeland identif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migrant hometowns along China’s southeastern coast and offer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the layered, dynamic, and situational dimensions of identity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Keywords:** composite homeland identification;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overseas Chinese; emerging emigrant hometowns.

### **Evolu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of**

**Ligongzhouxian in the Liao Dynasty** ..... **Yang Xiao** (78)

**Abstract:** Ligongzhouxian 隶宫州县 constituted a distinctive form of local administra-